

從韓戰管窺香港的冷戰文化

1950年爆發的韓戰，舉世公認是「冷戰」的開端。美國和蘇聯之間為了瓜分世界，把世界劃分成兩半。一邊是「自由主義陣營」，另一邊是「共產主義陣營」。兩個陣營之間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意識型態層面上持續對抗，使全世界長期處於二極對立狀態。這種二極對立的現實，也在思想和意識上造就一種二極對立的思維，無視現實世界裏存在着的多樣性和模糊性。這種二極對立的思維，在冷戰時期成為主導的世界觀，主宰着日常生活。甚至在今天的所謂「後冷戰」世界，也仍然支配着人們對複雜政治現實的分析，以及如何尋求真正超越冷戰框框的努力。

近年來東亞批判思想學界對冷戰和冷戰後的亞洲經驗和亞洲想像，掀起了熱烈的討論和研究的興趣。在說明「冷戰結構」對東亞仍然具有分析意義和政治判斷意義的時候，二極對立的思維仍然不時干擾着我們的思考，將亞洲政治版圖輕易地劃分成不是屬於「自由主義陣營」的一方，就是屬於「共產主義陣營」的一方，又或者把亞洲社會力量或思想分佈的地形，簡單地歸類為不是「親美反共」就是「反美親共」。本文以韓戰前後的香港作為研究對象，說明簡單的二極對立的「冷戰」圖式，並不能幫助我們了解香港複雜的文化政治。相反地，韓戰和冷戰對香港的影響，應該同時考慮以下的因素：

1. 冷戰中的美蘇對抗與複雜的英美盟友關係
2. 英國對香港的「非政治化」殖民政策
3.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對抗
4. 香港對中共的特殊價值

這些因素各自有其獨特的歷史條件和特殊的規律，不能簡單化約到同一個歷史總體中去。本文認為，只有同時考慮這晚幾項因素在歷史中展現的特殊性，才能全面掌握韓戰和冷戰大環境在香港獨特的歷史場合(conjuncture)底下，如何多重地決定着(overdetermine)香港在韓戰期間及繼後的冷戰年代的發展。

「東方柏林」與冷戰結構論

以冷戰的二極對立的模式去了解香港歷史的情況，一直存在於大眾話語及簡單的歷史書寫當中，例如馮仲平所編著的《英國政府對華政策 1945–1950》一書中，就曾引錄當時英國外相貝文(Ernest Bevin)向美國國務卿艾奇信(Acheson)表示「英國預備將香港變成東方的柏林」，他們也曾表示過，在必要的時候，決心令香港變成在遠東抵抗共產主義擴張的據點。¹而美國歷史學家 Nancy Tucker，也曾在她的著作《不穩定的友誼：台灣、香港和美國 1945–1992》中，引述美國第七艦隊總司令 Arthur Radford 的說話，把香港描述成「民主的堡壘」。²而美國總統艾森豪也曾兩度在致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信函中，答應如果香港出現敵對狀況，美國也會和英國站在一起。上面的這些歷史敘述，往往把側重點放在那些被提及的「冷戰修辭」，例如「民主堡壘」、「東方的柏林」等等，雖然這些辭令其實是不盡不實(例如香港從來就沒有甚麼像樣的民主制度)，但它們常常被引伸為充份的證據，說明英國和美國有了冷戰的共識，要以香港作為反對共產主義的基地。

毫無疑問，韓戰發生的時候，英國是美國的最堅定盟友。因

1 Feng, Zhong-ping (1994)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1945–1950*, Keele: Ryburn.

2 Tucker, Nancy (1994) *Uncertain Friendships: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Twayne.

為當時工黨的艾德禮(Clement Attlee)政府內有不少堅強的反共分子，例如外相貝文就認為蘇聯是戰後西方利益的最大威脅。但英國人也認為，冷戰的主要戰場在歐洲，所以不應在亞洲輕啟戰幔。而憑藉他們與中國長久打交道的經驗，也並不認為可以簡單地把中共視為受蘇聯指揮的傀儡。事實上，英國對華的外交政策，也並沒有太受冷戰思維的影響。英國早在1950年1月，就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韓戰的突然爆發，令英美措手不及，但同時也把兩者的判斷分歧拉近。雖然英國對戰爭的規模、範圍是有保留的，對英國參戰的模式也傾向保守，但在美國的努力遊說下，英國為保持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也積極參戰。在1950年7月，英國就率先派一旅軍隊在聯合國的名義下進入韓國作戰。在8月底，更從香港派遣兩個步兵營遠赴釜山。而韓戰期間，先後在韓國服役的英軍共計超過九萬人。³不過，縱然英國是積極的韓戰參戰國，而香港當時受英國管治，但英國卻小心地避免香港捲入韓戰，而事實上香港亦並未有真的成為「東方的柏林」，或者美國冷戰戰略下反共的基地。

英美聯盟，各懷心事

英國一方面要支持美國，但另一方面也小心翼翼地處理英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英國之所以這樣步步為營的原因，當然是二次大戰之後的英國和美國，各自有着不同的策略考慮和利益盤算。一方面，雖然作為戰勝國，英國從日本手上收復了香港、馬來西亞等殖民地，但英國在二次大戰之中的確元氣大傷，無復當年強勢。戰後東南亞的民族主義運動急劇升溫，英國的戰略目標是確保美國在東南亞可能出現的動盪中，會支援英國保護它在

3 <http://bbc.in/VQjuIo>，2013/02/12瀏覽

這些殖民地的利益，所以極需美國的支持，英國參與韓戰就是要換取這些支持所付的籌碼。但與此同時，英國在遠東並無足夠的軍力應付另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所以，英國也要極力避免讓美國當時在麥卡錫主義支配下那種強烈的反共情緒，打亂了英國人自己在殖民地的戰後部署。

所以，英國一方面在韓戰期間支援美國，也往往在美國人面前操持同一套冷戰修辭，表示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綫，以換取美國人對共同防衛馬來西亞及香港的承諾，可是這些承諾卻從來沒有化成具體的盟約。而針對香港的具體情況，英國人也不會高調地把香港推到冷戰對抗的前綫，在香港引發更大衝突，弄至局面無法收拾。⁴在這樣複雜的盤算底下，出現了一種非常吊詭的情況：英國一方面支援美國參加韓戰，甚至在戰場上和渡過鴨綠江支援北朝鮮的中國軍隊互相撕殺，兵戎相見，但韓戰並沒有把香港變成反中共的前綫。英國雖然仍然透過比較緊密的方式在香港箝制共產黨的活動，例如比較嚴苛的電影審查，取締從事政治活動的學校，和強迫社團登記等，但同樣的措施也用在反共的親國民黨勢力身上。只要他們依據香港法律，英國亦沒有意圖取締共產黨在香港一如既往的活動，因為英國要在中共和美國之間，謀求達成一個微妙的平衡狀態。

很能說明香港的英國當局如何周旋於與美國和中共兩邊的尷尬位置的，無疑是中國民航事件。⁵事緣中共政府在1949年11月正式接管了中國民航公司，並向港府要求移送七十部在國民黨自大陸撤退過程中，駛到香港的民用飛機。然而，中國民航公司以往是一所親國民黨的公司，而該批飛機原初也是由美國人那邊租借過來。為免這批有戰略價值的物資落入中共手中，也為免投資化為烏有，美國方面極力向香港政府遊說不要把飛機移送大陸，

4 見麥志坤(2018)《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

5 陸恭蕙(2011)《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香港大學出版社，第五章。

並威脅如果飛機判歸中共，美國會考慮切斷馬歇爾戰後復元計劃(Marshall Plan)對英國的援助。當時總督葛量洪(任期1947-1958)為免得失雙方，建議中、美雙方可以在港進行訴訟，以決定飛機擁有權。雖然香港的法院最後裁定飛機由中共所有，但美國政府十分不滿，美國國務院更向倫敦方面施壓，最後英國屈從於美國的壓力，透過樞密院(Privy Council)為此下了一道樞密令，推翻香港法院原有裁決，飛機於是在1952年最終移送美國，雖然事件令港督葛量洪十分不快。

另一件類似的事件是，一艘二戰期間被盟軍在台灣高雄擊沉的萬噸日本油輪，被一間中國公司拖到香港黃埔船塢維修並準備駛往中國。修好之時剛好是1951年，韓戰正打得火熱。美國認為它會令中共軍用運輸能力增加，威脅在韓作戰美軍的安全，因而向英國施壓，務求禁止中共獲得此油輪。英國內閣向美國屈服，下令徵用這艘船。但同時英國亦一口拒絕台灣方面提出要購買這艘船的要求。顯然，英國雖然和美國站在韓戰戰場的同陣線，而美國因為冷戰需要而扶植在台灣國民黨，但英國並不願意與國民黨之間有任何過份親善的關係，以致它要進一步和中共對抗。

港英的「非政治化」殖民策略

在韓戰期間，英國拒絕讓香港成為美國反共鬥爭的前綫，其實是上承近代以來英國在香港的施政傳統。這種讓香港維持一種不干預周邊地區政治的中立政策，並沒有因為韓戰的爆發和冷戰的對抗而有根本的變化。因為英國主要的目的是維持香港作為一個自由貿易的商埠，而一個被捲進嚴重政治鬥爭的香港，對英國並無好處。事實上，這項不容香港捲入中國政治漩渦的中立政策，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晚期，即清朝末年。當時孫中山以香港作為其中一個策動推翻清廷的革命的地方，但遭到英國方面的警

告和反對。英國殖民地部的大臣駱克(Stewart Lockhart)就曾親自致信孫中山，表明「本政府雅不願容許任何人在英屬香港地方組設策動機關，以為反叛或謀危害於素具友誼之鄰國」。⁶而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歲月，不少香港華人和他們當中的社團領袖，都或多或少地熱烈地參與到中國政治中去，當年香港政府亦就此向華人領袖發出警告。

戰後香港總督曾經先後把英國對中國問題的中立政策解釋過。葛量洪(Grantham，任期1947–1957)就認為，英國只有在所有與政治意味有關的問題上維持嚴格的法制原則和中立原則，不涉政治，這種立場才能最為有力。相反的話都會令英國在外和在內都變得脆弱。而繼葛量洪任香港總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任期1958–1964)也曾聲言無意容讓香港被利用為針對中國的敵意行動的基地。而無論任何時間，無論來自哪一個方向的顛覆性行動，一旦發現都會被果斷地鎮壓，警察會保持中立。

不過事實上，在民國的數十年間，這項將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政治隔絕的做法，未必完全成功。而在1925–1926的「省港大罷工」中，中共亦曾經直接的挑戰港英政府。然而，自此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未有再次作出太大的動作，去動搖香港政府刻意保持香港「中立」、「平衡」。而自1937開始，因應日本侵華而出現的新形勢，英國一方面宣佈香港是「非戰區」，取締公開的反日活動、審查反日報章，但另一方面，自1938年起亦默許中共在香港開展工作。⁷

就是由這個時候，中共開始利用香港對藝術家、作家、電影人進行積極的組織和統戰工作，成為日後中共駐港工作系統的雛形。⁸而雖然國民政府在香港常常面對共產黨對自己的攻擊，但

6 莫世祥(2011)《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頁90。

7 陸恭蕙(2011)《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頁66。

8 直至日軍佔領香港，中共的組織系統轉為地下統領對日的游擊戰。抗日勝利

也接受只要這些中共搞的活動符合香港法例，香港政府並不會橫加干預。及至中國內戰爆發，共產黨更為積極地利用香港作為對華南地區宣傳及其他工作的中心，並以「新華社」(即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的名義作為中共駐港的實質代表機構公開運作。有趣的是，雖然當時中共正與仍是正統的「中華民國」政府軍作戰，但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喬冠華也曾私下表示，中共歡迎英國政府重申，不會容許香港成為一個反對中國政府的基地。

國共鬥爭與左派文化的擴散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鬥爭，始自孫中山死後蔣介石放棄「聯俄容共」的政策而進行清黨。中日戰爭曾經一度促成國共合作，但抗日戰爭後立即轉成國共內戰。香港雖然不是軍事上的戰場，但也是兩者交鋒的地方。隨着1949年的臨近，內戰愈趨激烈，香港社會亦急劇分化，沿着國共兩黨而分裂成「左」「右」兩個對峙的系統。不單報章分成左右兩派，工會、學校、文藝社團、電影、體育……等各界都分成左右兩派。呈現一個雙峰對峙的局面。而英國人對此一直袖手旁觀。

1949年中國內戰形勢急轉直下，漸漸分出勝負，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不斷敗退，他們在香港和東南亞華人地區的宣傳工作上亦見頹勢。香港市面上佔有壓倒性的優勢的是親共的宣傳。而原來親國民黨的「右派」組織和機構亦見人心渙散。相反地，愈來愈多的人支持親共左派。再加上因為中國內地國共鬥爭愈趨激烈，不少大陸屬左派的文化人受到國民黨迫害，紛紛南來香港避難，一時之間，香港的左翼文化界變得非常熱鬧，左派文化活動亦見蓬勃。他們透過各項文化事業單位，例如報紙、雜誌、書

後，中國內戰隨即爆發，中共繼續利用香港作為訓練游擊戰士的基地，但重點還是在於推動宣傳、組織和統戰工作。

局和電影院等，積極地進行反國民黨的宣傳和宣揚革命。

就以電影為例，據電影人許敦樂的研究，從1946–1953年間，親共的南方公司就香港發行了一百部蘇聯電影。在這幾年之間，大量由大陸逃來香港的左翼文化人大力宣傳推介蘇聯電影文化，形成一時風尚。蘇聯電影在香港放映，有力地挑戰了之前受荷里活電影和英國電影支配了本地電影放映市場的局面。當時放映的蘇聯電影題材廣泛，有戰爭片、文藝片、神話片、歌舞片、紀錄片等，當然也少不了政治宣傳片，例如歌頌斯大林事跡，描述革命英雄和婦女如何登上政治舞台等題材的電影。當其時香港的電影審查，主要針對中國電影，對蘇聯電影則比較寬鬆，因為香港政府認為觀眾對蘇聯情況比較隔膜，而且觀眾多局限在知識界和文化界。但在韓戰爆發之後，帶有政治題材的蘇聯電影亦往往被禁映。在中國內戰高潮及韓戰的這幾年間，香港蘇聯電影的突然冒升曾經令荷里活的影商和反共的人士感到威脅，認為共產黨的宣傳開始危及荷里活的陣地。為此他們相互傳遞訊息，要求反共人士警惕。⁹

事實上，在1949政權轉移的前夕，左派的文化系統在香港已頗有規模和相當的影響。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共對香港工作的領導，中共更在香港設置黨的支部組織「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工委」），統領各門各類報刊工作和文化工作，為各階層不同文化背景和閱讀趣味的人士辦報紙和雜誌：由政治大報、文人雜誌、兒童刊物、文藝創作及評論等各式各樣的「親共/愛國」報章。除此之外，中共領導底下的「左派」還有一批數量相當的「愛國學校」，一個擁有會員達二萬多人，「能量頗大」的「工聯會」及其下大量屬會，幾十個在音樂、戲劇、文學、藝術等領域活躍的社團和青年組織。它們的影響力主要在工人、青年

9 許敦樂(2005)《墾光拓影》，MCCM Creations。

和學生中間，也在商界和漁農領域有頗大的潛在力量。¹⁰ 雖然自始至終，香港親中共的「左派」力量在殖民時期的香港都只是一個「非主流」的少數。

美國新聞處與文化冷戰

為了因應中國政權易手，和韓戰爆發的急迫形勢，美國在1950年開始透過美國新聞處的介入，打破了親共宣傳一面倒的局面。一方面，香港的美國新聞處，組織一系列針對東南華人的冷戰反共宣傳計劃，當中包括出版(原名《今日美國》)半月刊，作為美國政策的官方喉舌。它解釋美國的外交政策，報導「自由世界」的新聞、中國大陸的發展。這份半月刊的內容，也包括不少文藝、娛樂的文字與圖片，每期發行十五萬份，超過一半在香港及台灣銷售，其餘透過東南亞其他地方的美國新聞處送贈。另一方面，美國新聞處也組織翻譯、出版、印刷和購買本地出版物送往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活動，支撐反共刊物的出版，使香港短期之內扭轉局面，成為出版中文反共書刊最蓬勃的地方。香港的美國新聞處，也集中相當的人力，在香港搜集中共大陸的情報，匯集成篇，整理分析，並譯成英文，向世界其他地方針對中共的宣傳進行反宣傳，這就是所謂「匪情研究」。¹¹

美國新聞處的「文化冷戰」計劃，剛好符合了因為在1949年政權易手前後，因為逃避共產黨上台而南下香港的大批政治及經濟難民。這些逃難者大量來港，與1949年之後大量「左派」文化人嚮往「新中國」而「北歸」，形成強烈的對比。這種一往南，一往北的雙向遷徙，大大地改變了香港的文化政治生態。「反

10 周奕(2002)《香港左派鬥爭史》，利文出版社。

11 趙綺娜，「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美國新聞處：美國在亞洲之反共宣傳政策研究」，台灣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2005年4月)。

共」的右派文化力量，獲得了迅速的提升。美國在香港的「文化冷戰」計劃，亦以針對這批反共的難民社群需要而開展。美國新聞處以雄厚的資金，支援反共刊物的出版，為不少反共文人提供生計。美國為收集大陸情報，也大量依賴由逃港難民提供資訊，和中共狀況的分析，因而亦使香港成為「匪情研究」的中心。

由美國新聞處直接主持的文化冷戰計劃，目的是宣傳「自由世界」的正面訊息，以抵制那些醜化西方世界的親共宣傳，以及揭露中國在共產黨掌權之後的黑暗面貌。這是符合美國的冷戰戰略考慮和利益。因為韓戰而使美國有必要鞏固亞洲的反共防綫，因此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亦成為美國支持的對象。因此之故，美國新聞處對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宣傳，也要夾雜對位處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辯解和讚頌，因為美國人當其時所承認的是國民黨政府代表的「自由中國」。美國新聞處當其時的立場是要求東南亞反共的華人團結支持「自由中國」，因為它仍是「反抗共同敵人的象徵」和「保護真正中國價值的守衛者」。

可是，當其時香港的反共難民當中雖然反共，但他們有不少也是蔣介石的批評者，例如當時一些「既反共，亦反蔣」的「第三勢力」，他們在反對共產主義之餘，亦不斷攻訐蔣介石政權。但為了「保蔣反共」的冷戰政策，美國新聞處亦透過經濟手段，誘使這些「反蔣」的刊物停止出版，以使文化領域減少批判國民黨的聲音。美國新聞處所代表的美國冷戰政策，自然亦令香港當時不少的反共難民難以認同。他們漸漸認識到，美國雖然強大，但反共政策搖擺不定，美國利益也難與華人的利益一致。所以寄望美國的反共政策能令他們重返大陸也是十分渺茫的希望。及至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美國新聞處的官員也曾表示，要令人們接受美國的亞洲政策和行動非常困難。¹²

12 趙綺娜，同上。

保蔣反共，困難重重

事實上，由美國新聞處親自主持的文化冷戰計劃，也因為英國與美國是抱有不同的對華政策而困難重重。英國對美國人在香港高調的冷戰反共宣傳步步為營，因為害怕這些活動會惹來中共的強烈反應，所以香港政府也對美新處的活動嚴加監視和箝制，而美國新聞總署也不時叮囑香港美國新聞處要和英國殖民政府保持良好關係。

在美國於香港直接推行冷戰反共宣傳成效有限的情況下，美國文化冷戰的重點後來慢慢轉移為支持一些居港的反共學人復興中華文化的計劃。透過幾個非政府組織，例如雅禮協會(Yale China)、亞洲協會、福特基金會、哈佛燕京學社等，美國人支持那些反共學人推動高等教育事業。最重要的例子是「新亞書院」。他們認為中華文化是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的，所以在香港支持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有效制衡共產主義。這些以文化冷戰，以遏制共產主義擴散為使命的美國基金，選擇以香港而不是台灣作為他們資助對象建立高等教育機構的決定，也反映出他們希望和台灣國民黨政府保持距離。¹³ 而雖然新亞書院那一批反共的新儒家學者，雖然仍效忠中華民國的旗號，也堅持在每年十月十日的辛亥革命紀念日(即「雙十節」)作為他們「國慶」的日子，但他們選擇落腳在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也顯示出他們並沒有完全的認同美國政府「保蔣反共」的冷戰戰略。

事實上，美國在香港以文化冷戰的思維來推廣反共主義是不可能取得完全勝利的。因為首先，美國無法在香港禁絕親共思想和文化的傳播，也不能全面壟斷香港的文化、教育和廣播系統。其次，美國和西方世界是自由體系的事實，與香港殖民地的現實只有部份重疊。香港雖有英國人及其法治體系保障的基本自由，

13 周愛靈(2010)《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

但殖民地卻依靠專權統治，仍然與美式冷戰想像中的理想「自由世界」有一大段距離。這種宣傳與現實的差距亦留下缺口，使日後香港青年在接受了冷戰美式自由世界的右派宣傳後，卻仍會在六十年代末期轉向左翼。¹⁴ 第三，香港的反共主義基本上是「國共相爭」框架的延續。但國共兩黨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政黨，兩者的對抗基本上是兩種民族主義的相爭，但美蘇之間相爭是關於世界霸權，以及兩種意識型態。但國民黨既不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力量，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亦與蘇式馬克思主義經常保持着距離。兩黨之間在很多方面的共同點或更多於他們的差異點(例如兩者都強調自己是「革命政黨」)。一九五〇年代美蘇之間的鬥爭，把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放在一個冷戰對抗的框架下，並無改變兩者既有的鬥爭方式。第四，國民黨在香港並非一股能團結所有「反共力量」的象徵力量，而當美國要假借國民黨之外的本地(或寄居本地)的「反共力量」作為代理人的話，美國人要令他們의思想和活動完全配合美國的冷戰政策是不可能的事。

「抗美援朝」與反美宣傳

可是相對來說，雖然美國文化冷戰在香港未能取得絕對優勢，亦不代表中共在香港的冷戰宣傳一帆風順。事實上，在韓戰爆發的時候，香港的「左派」文藝界，並沒有甚麼準備去回應發生在朝鮮的戰事。就以左派的喉舌報章《文匯報》的「新文藝」版及《大公報》的「文藝」版為例，在韓戰發生的1950-1953年期間，大部份關於韓戰的文藝評論及文學創作，都只是轉載自國內報刊。那些號召文藝工作者動員起來支援中國參與韓戰立場的評論，亦用非常直接的語言，指明要以文藝為中國「抗美援朝」

14 羅永生(2014)「六、七十年代的回歸論述」《殖民家國外》，牛津大學出版社，頁68-89。

這項「政治任務」服務。例如在轉載自《長江日報》發自中南文聯籌委會的〈文藝界動員起來，為反對美帝侵略而戰鬥〉的文章中，作者就寫道：「我們號召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我們要歌頌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深厚友誼，歌頌與支持朝鮮人民英勇鬥爭。」接着，這份動員令亦用「硬銷」式的語調說要「教育全體人民仇視美帝、卑視美帝、蔑視美帝。通過文藝形式來克服部份人頭腦中的『恐美』的錯誤心理，並要與『親美』的反動思想進行尖銳的鬥爭。」¹⁵

除了這些動員令式的文章，香港的幾份「左派」報章的文藝版也連篇累牘刊登文章批判美國文學。一方面，這些文章抨擊美國政府以政治理由迫害作家，另一方面，這些文章也批評美國文學是腐爛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藝術，它們之所以腐爛，正因為沒有政治的作用。例如，趙蘿蕙在〈美國文學的一斑〉中就把美國文學的主題歸類為不外乎描述殘酷兇險、變態心理、完全的理想主義，或者道德沒落。他批評美國文學只「把技術淪為機巧，內容提煉成麻醉劑」，「不能質樸真摯，又不能在人群的社會中負起啟發、教育、訴述和感動的作用」相比之下，「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應感覺到慶幸，我們的人民政府這樣慎重的計劃我們的文藝政策。」¹⁶

根據本地學者張詠梅的研究，香港的左派報章當時為了完成宣傳抗美援朝的政治任務，從內地轉載了不少詩歌和小說創作方面。例如姚錦的《幸福》描寫中國軍人和朝鮮女性的結合，以犧牲個人幸福來反襯反美鬥爭的偉大，譴責美國的不義；李威崙的《私生子》敘述女主角克服思想矛盾，決定參加抗美援朝的志願軍；黎克的《祖國在召喚》號召人民為祖國參軍；超祺、力文

15 中南文聯籌委會「文藝界動員起來，為反對美帝侵略而戰鬥」，《文匯報·新文藝》，第20期，1950.11.13，頁5。

16 趙蘿蕙「美國文學的一斑」《大公報·文藝》，第177期，1950.12.17頁2:7。

的《他們在朝鮮爭取立國際功》等都在宣傳抗美援朝……這些小說，大都出自國內作家的手筆。正如其他為政治而寫的文學一樣，是主題先行，大多透過典型人物和情節，簡單直接的表達方式和粗糙的象徵手法，以求達到政治任務中期望的最直接宣傳效果。¹⁷ 然而，這些轉載自大陸，針對大陸語境的作品，除了單面地使人了解中共當下的反美政策需要之外，並無法緊扣香港本地的特殊背景和需要。例如，宣傳參與中國志願軍去「抗美援朝」在香港實在無法引起甚麼共鳴和產生甚麼作用，在「左派」圈子之外實在難以引起有意義的回響。

反美是否等同反資反殖？

事實上，只有在韓戰結束之後，一些更熟知本地情況的左派作家才寫作出一些切合本地讀者需要的反美作品。例如，作家阮朗就針對韓戰對香港的經濟衝擊和民生的影響去突出反美的主題，矛頭直接指向美國對中國的禁運如何做成香港的經濟不景。在他的小說《華燈初上》中，直指禁運的打擊不單使香港經濟衰退，也禍及不少工廠需要裁員倒閉，導致工人失業，生活陷入困境。當工人生活出現問題，只有左派工會幫助工人才能暫時度過難關。而美國的禁運政策則被指責為一切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因為它們帶來工人困境，也使資本家受到損失，甚至禍延女性要被逼淪為舞女，出賣色相。透過女主角的聲音，作者強烈地批判美國：「我恨禁運，以及主張禁運的人」「禁運是殺人不見血，害得我們家裏好慘。」¹⁸ 在另一本小說《懵人日記》中，反美的主題針對美國在六十年代初限制香港紡織品入口而實行的限制配額政策。

17 張詠梅(2003)《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67)》，天地圖書，頁99。

18 同上，頁100-103。

雖然這些反美小說也是主題先行，而主角及其遭遇也是臉譜式和公式化的，但總算是結合了本地生活的實況。再者，在反美的大前提下，這些較有本地敏感度的小說也會放下對資本家的批判，而把資本家也描述為美國強權的受害者。例如啟林的《真誠的友愛》裏面的一位工友說「今天老闆也有他的困難，而我們工人，素來是不會強人所難的。」《槽人日記》裏面，作者以地道的廣東方言書寫，主角也談到「事實上唔關勞資雙方之事，大家都係俾美國佬臘起」（「事實上這個與勞資雙方無關，大家都是被美國人所害」）。

冷戰是美蘇之間的對敵，冷戰也被視為處於二極對立的意識型態之爭。中國在韓戰之初的反美動員，也是按這種二極對立的圖式展開反美的宣傳，因此之故，美國也被處理成絕對的敵人。按照在典型的冷戰對抗二極對立的教條，反美、反資、反殖和反蔣等，都是同屬一個整體的目標。可是，在香港的獨特的歷史組合環境下，以「反美」來統領「反資」、「反殖」並不能回應本地的現實，也與中共自身對香港的政策方針不符。毛澤東早在1946年就向一位英國記者Gordon Harmon表明，中共並不急於收回香港，他說：

我們是否要回香港……中國的麻煩已經夠多了。我對香港不感興趣；中國共產黨對香港也沒有興趣；香港從來都不是我們討論的話題。或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我們可能會要求討論香港回歸的問題，但我的態度是，只要中國人在稅收和政治代性上不被歧視，我就對香港不感興趣，而且肯定不會允許香港成為貴國與我國之間爭議的焦點。¹⁹

後來在1967年回應香港發生大規模的，由「左派」策動的暴

19 陸恭蕙(2011)《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頁83。

動中，周恩來又再重申中共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政策。所以，中共從來都視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是對它有利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冷戰話語當中徹底的「反殖」訴求也是與中共的香港政策相違背的。於是，「左派」宣傳機器在韓戰期間為了「反美」而高調地祭出的「反帝」、「反殖」口號和宣傳，在韓戰結束後很快就消聲匿迹。雖然，批判殖民地現狀和香港政府施政，仍然是左派文宣的特色，以至不斷在文宣中出現負面的香港警察形象，並以隱晦的方式，間接以批判外地殖民主義狀況的方式批判香港的殖民現狀。但在五十年代，這些批判從來沒有像在韓戰時期反美文宣所提出的，要以徹底的推翻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作為出路。當然，這個亦與當時香港政府不會容忍對明目張膽的「反英」政治文宣有關，但如無中共及其文宣系統主動「為大局」而迎合，並進行自我審查，這種批判殖民現狀的自我約束也是不能想像的。

「新中原心態」與香港左派困境

戰後香港緊隨中共的「左派」原則性強烈地擁抱反美反帝的左派意識型態，但現實又只能接受香港在「任務上」只能「自我局限地」(self-limiting)反殖。兩者之間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心理張力和文化張力，使香港的左派思想成為一種自我欣賞的精英主義和充滿「祖國情懷」的愛國主義。這個革命精英的自我想像和北望投射，在整個五十年代形成一種張詠梅所說的「新中原心態」，亦即無條件地認同「新中國」，站在「邊緣」的香港，以「新中原」的代言人自居，向香港人不斷宣傳代表光明、理想和希望的中原，說服他們「北歸」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²⁰ 這種脫離香港在地狀況的左派實踐慢慢地把「左派」社群從香港社會

20 張詠梅(2003)《邊緣與中心·論香港左翼小說中的「香港」(1950-67)》。

中孤立出來，形成一個自我封閉的小圈子，鞏固着一種只供內部的溝通方式和缺乏反思的信仰。

韓戰時期，中共為香港下達的冷戰式「反美主義」的路線，在當年並沒有為「左派」在香港爭取更大的支持，使「左派」爭取得更多群眾。再加上前述所談到香港「左派」和「右派」在人口上互相此消彼長，那種一面倒式的反美冷戰宣傳，反而是使「左派」更脫離香港社會的現實。這也就是曾任中央駐港最高領導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所講，香港的「左派」所走的是一條「一左二窄」的政策。²¹

事實上，回歸中共幾十年的歷史，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被指為走上「極左」錯誤路線的時期。可是，參加韓戰這一頁歷史卻往往缺乏反思。不過，問題可能不在於僅僅去衡量當時中共參與韓戰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當時的路線是否「過左」，而是冷戰文化所預設的二極對立背後那種總體主義的思維模式，如何總是在錯綜複雜的在地處境中遮蔽了矛盾、斷裂和差異。韓戰中的香港，是一個斷裂的空間，反美、反資、反殖與反蔣並不能輕易地相互還原與化約。如果「左派」在這個空間的「冷戰實踐」是失敗的話，所相對應的也是「右派」「冷戰實踐」的不可能真正成功，因為香港複雜的歷史構成，以它內部各種錯置的實踐空間，也無法輕易為美式自由主義所總體化。

真正能顯示這種吊詭的是，韓國的戰爭與香港可能只是在歷史上擦身而過，但香港可能是韓戰當中的唯一得利者。因為雖然左派文宣指當年禁運對香港造成很大打擊。但歷史說明，香港日後快速的經濟起飛，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韓戰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去令香港成為一個中國唯一可以繼續利用來突破禁運的自由港。因為中國要仰賴香港作為當時獲取外匯的窗口，這亦令中國和英國在戰後香港，共同維持了幾十年幾乎不受挑戰的殖民

21 許家屯(1993)《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臺北：聯經。

統治，以及成就了這個後來啟發「新自由主義」復興的資本主義烏托邦。關於香港發跡的「愛國資本家」(例如霍英東)的神話，都是環繞着他們當年如何利用走私替中國突破韓戰禁運，從而開始致富。這些神話正好是冷戰二極對立的反面，亦即二極融和：他們既深愛共產中國，亦體現資本主義的自由冒險與企業家精神。然而，不應忘記的是，他們的勝利是建基在韓國一場引致數以百萬死亡數字的戰爭。

「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與「反殖」的歧義

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下稱「中文運動」)，是香港戰後第一場和平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對香港本土社會的發展、對華人地位的提升、對中文教育的促進，以至對繼後香港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勃興，都有舉足輕重的深遠影響。可是，在日前有限的關於香港社會運動的文獻中，對這場「中文運動」的研究甚少。而且在僅有的關於香港學生運動歷史敘述中，「中文運動」往往被置放到邊緣的位置，僅僅被表述成邁向七十年代「火紅年代」左翼學生運動的過渡性事件。這種敘事往往以「保釣運動」作為當時學生運動的中心，突出「保釣」在推動香港新一代學生認識及認同中國的劃時代意義，卻也無形中遮蓋掉「中文運動」的豐富內涵，以及它所展現出的複雜文化政治意義。例如，1983年由親中機構廣角鏡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就只有不足一千字的篇幅交待和分析中文運動。結語更只寫道：「中文運動是一個改良主義運動，雖然含有一層民族色彩，但僅只談及文化而已，對民族的前途、國家的了解均沒有涉及，只是符合了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推崇感，但它也具有一些好影響，使同學們了解到殖民地政府對任何輕微讓步也是不甘心，只有通過團結鬥爭才可達到目標」。

港英殖民體制與戰後香港社會

要重新評估「中文運動」對香港的歷史意義，我們首先要明

白戰後香港的處境。也就是說，既要了解香港獨特的殖民地性質，也要了解戰後香港如何處身於國民黨(右派)和共產黨(左派)互相對抗的「冷戰」格局。本文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如何透過「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這一個案，了解香港在冷戰二元對抗的構造下，如何開展本身的解殖民運動。

首先，自1842年開始，香港成為英國統治的殖民地，最高的行政權力由英國派來的總督行使。歷任總督在憲制上可以獨攬大權，惟因為「間接管治」的施政原則，也吸納少部分華人精英進入建制，委任少數華人以非官守身份為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以利了解華人社會的民情。只有職權局限在衛生環境等有限市政措施的市政局(Urban Council)，方有少數議席由選舉產生。但參選資格和投票資格都有嚴格限制，選民登記一直情況冷淡。再者，因為戰後香港人口大部分都是由中國內地逃難或移居來港。他們若非政治冷漠，只顧謀生，就是分別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港的政治組織所帶領，其政治意識型態為兩黨之間的冷戰式對抗所左右。分屬左與右兩派的華籍居民，對香港本地的殖民政體架構，也是十分疏離。

在這樣專權的殖民體制下，能影響政府施政，上達輿情的公民團體並不多，自主的公民社會並不發達。能被政府認許的公民組織十分有限，戰後初期就只有少數由華洋精英共同組成的團體，例如「公民協會」及「革新會」等，會透過溫和與非常有節制的方式，在有限的渠道向政府反映意見。但由於這些團體的領袖，除了外籍、外裔，就是少數能操熟練英語，屬中上階層的華人，他們大都只是作一些忠誠反對派式的改良主義姿態，呼籲政府重視民意。他們的角色，就是作為官民橋樑，修補官民隔膜。他們中間縱有某些人具進取的改革意願，例如六十年代曾出現過的民主自治運動訴求，也難以將這些改革的理想化為直接組織，和連結廣大香港市民的力量。

五、六十年代，港英政府因香港前景並不清晰，欠缺發展計劃。政府內部貪污腐敗風氣也嚴重。在六十年代中期，社會怨憤爆發，相繼釀成六六年及六七年的兩場暴動。六六年天星碼頭加價所引起的騷亂，迅速被鎮壓平息。但六七的那場由工業糾紛引發的暴動，就由於香港的親中共左派受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混亂所影響，採取了急進的暴力的手段，造成重大死傷，更在一時之間，使香港陷入危機狀態。雖然危機最後也被平復，但殖民政府和華人民間的對抗與張力卻愈見明顯。於是，「中文運動」便在暴動後的環境下，迅速成為新的社會運動目標。

五月暴動與中文運動

事實上，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呼聲，早在六六及六七的暴動之前已有人發出。在1964–1966年間，市政局議員胡鴻烈早已多番提出要把中文列為官方語文，要求在市政局會議中使用中文。香港大學的學生報《學苑》亦曾發文支持。不過，對這項訴求的支持，要在1967年5月暴動發生之後，才形成火速蔓延的趨勢。代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學聯報》、中文大學各書院的學生報、新界鄉議局等，迅速在1967年下半年間，相繼發表支持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立場。當其時這些言論，大都將港府接納中文為「官方語文」，與暴動後香港如何修補社會分裂的鴻溝相互連結。例如，1967年11月1日《學苑》的「編者隨筆」，就說道：

最近的動亂，主要的因素，無疑是一小撮有政治背景的不法分子在搗亂，但這同時也反映了香港社會裏官民的隔膜，因而使左派分子有機可乘……遺憾的是，政府對於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建議，並沒有任何具體而積極的表示……假如政府不盡快在這件事上表明態度，無疑將會引起極大的惡果。